

21 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研究特征论

方舟¹

【摘要】 随着科幻小说创作的再次崛起，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研究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研究体系，呈现出三大新的特征：一是围绕科幻界热点事件，科幻小说研究热潮频出；二是因外国科幻小说中译本和中国科幻作品外译本的增多，科幻小说译介成为新的研究亮点；三是对人工智能和赛博朋克等为主的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的研究，更新、拓展了传统科幻小说研究视野与思想空间。本文对 21 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研究进行了梳理、阐释，揭示出其特征与话语机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

【关键词】 21 世纪 科幻小说研究 三大特征 问题反思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22）02—0104—06

进入 21 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传媒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相比于上个世纪，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围绕太空、外星人和高科技等的“硬科幻”，还是加入了更多故事性与人文元素的“软科幻”，亦或是新浪潮后出现的一批以赛博朋克、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幻题材作品，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科幻小说一直以来所处的边缘化境地逐渐得到改善，开始进入主流文学读者视野。随之而来的是科幻小说研究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身科幻研究，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将科幻小说研究纳入学科规划体系，不少学术期刊为科幻小说研究开辟专栏，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一道新的景观。本文将系统考察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情况，探讨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新特征，揭示其内在话语机制，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三次研究热潮

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在主流学术界其身份一直无法得到认同，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常处于边缘，学术地位与影响力都无法与其他文类研究相提并论。进入 21 世纪，随着科幻小说迅速崛起，科幻小说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文章数量显著提升，内容趋于多样化，并出现了三次研究热潮。每次热潮过后，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便进入到新的阶段，这在过往的研究史上几乎很难看到。

第一次研究热潮以 2010 年为起点。2010 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创办，中国科幻事业迎来黄金发展时期，同年在上海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韩松和飞氲作为科幻作家代表参会并发言，引起了主流文学界的关注。《人民文学》2012 年第 3 期以系列专题形式刊登科幻作家刘慈欣的 4 篇作品《微纪元》《赡养上帝》《诗云》《梦之海》，这是《人民文学》继 1978 年第 8 期刊登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再次刊登科幻作品。《人民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以茅盾所说的“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¹为办刊理念，它对科幻作品的关注重新点燃学术界，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的课题“20 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立项资助，这是国内首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科幻类研究，2011—2012 年间另有“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现代性批判视野下的反乌托邦小说研究”等三项与科幻小说研究相关的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引起学界重视。此次研究热潮在内容上关注的主要有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探讨，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以及科幻小说的翻译等。涉及的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戏剧电影，还有工业经济、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硬件技术、航空航天科学与工程等，说明“科幻”内涵之丰富，已经远超传统文学范畴。从研究主体来看，涌现出了

作者简介：方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2。

王卫英、吴岩、高亚斌、李英等一批科幻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机构的科幻文学研究发展迅速。

第二次研究热潮发生在 2015 年前后。如果说上一次研究热潮更多来自主流刊物对科幻小说的关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指引，具有浓厚的学术规划意味，那么，此次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热潮则由科幻小说奖项带动。这股“科幻热”缘于 2015 年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这一奖项对刘慈欣本人来说是极高的荣誉，对中国的科幻事业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科幻小说不再被归入“小众”文类，其作为一种文学门类正式走入中国广大读者的视野。围绕《三体》所展开的二次创作，如短视频、歌曲、广播剧、动画等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由“三体热”引发的连锁效应更是带动了整个科幻界的崛起。2016 年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叠》获得第 74 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将这股研究热潮继续延传下去。某种意义上看，《北京折叠》继《三体》之后再次获奖说明中国科幻绝非“昙花一现”，而是具备持续输出优秀作品的能力，其背后是中国科幻人多年来为科幻事业所进行的不间断的奋斗。从该时期的研究主题来看，“刘慈欣”“《三体》”“雨果奖”“《北京折叠》”等的出现频率明显提高，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部分刊物为科幻小说研究开设专栏，如《中国比较文学》2015 年第 3 期以“全球化时代的科幻文学：晚清与当代”为主题刊发了 8 篇科幻主题论文；《文艺理论研究》2016 年第 1 期的“科幻小说研究”专栏刊发了 5 篇科幻主题论文。这一时期科幻研究队伍逐渐壮大，除了原有的学者继续科幻研究外，汤哲声、王瑶、李广益、任冬梅等成为科幻研究的新势力，越来越多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纷纷将“科幻”纳入研究规划中。

第三次研究热潮发生于 2019 年。这次热潮主要缘于 2019 年春节档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上映，与前一次由小说带动的研究热潮相比，科幻电影的热映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拉近了科幻与大众的距离。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是《珊瑚岛上的死光》，其改编自童恩正同名小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于 1980 年拍摄，曾经轰动一时。《流浪地球》在 2019 年的大获成功，既是对《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接续，也是中国科幻事业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在此次由电影所带动的研究热潮中，学术界对科幻小说改编成为电影的过程较感兴趣，随之而来的是对科幻文化景观、科幻产业发展等的关注度的提升，出现了一批与科幻文学产业化相关的研究，以及关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科幻游戏的三位一体的研究。该时期值得关注的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刊发科幻小说研究的期刊级别较以往有了一定的提升，如《文学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探索与争鸣》《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中国出版》《电影艺术》等一批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都刊发了与科幻题材相关的研究文章。除此之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各类省级社科基金关于“科幻小说”主题的项目立项数明显提升。

新世纪科幻小说的三次研究热潮是中国科幻小说研究阶梯式发展的缩影，从产生机制来看，发生了由学术引领到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带动的新变；从研究内容来看，从对传统的经典科幻作品、科幻理论的解读，到对中国当下重点科幻小说的关注，再到由科幻小说所带动的多元化科幻景观和科幻场域的探讨，研究空间日益拓展。这些都说明中国科幻小说研究触角越来越敏感，视野越来越开阔，问题意识不断突出，并逐渐融入主流文学研究体系，为主流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话语领域。

二、译介研究出彩

三次研究热潮的出现，表明“科幻小说研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其以挑战者的姿态，逐渐确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科幻小说译介研究成为新的亮点之一。译介学不同于翻译学，其探讨的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等，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²回看 21 世纪之前与科幻小说有关的翻译研究，大部分围绕的是国外科幻小说的中译，而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外译研究屈指可数。中国科幻小说的外译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4 年，老舍的《猫城记》被 James E. Dew 翻译成英文；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叶永烈、吴定柏、郭建中、韩松、吴岩等学者积极将中国科幻作品翻译到国外，但并未形成气候，最直观的原因是缺乏可译介的对象。据统计，2000 年以前，中国科幻小说的英译出版物仅为 9 部³，其他语种的出版物也屈指可数。进入 21 世纪，中国科幻作品的外译本数量不断增多，译介对象所处的时间段、国别以及类型等均有所扩大，学术界对科幻小说译介研究的关注度也得到提升。

大体而言,学界对科幻小说译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从宏观层面对译介历史、特征及传播进行梳理。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从整体上对科幻作品的中译及外译情况进行概述,有的侧重于特定的时期、国家和作者,还有的聚焦于译介的整个运作过程,从翻译到公开出版发行,再到读者层面的传播与接受。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科幻小说译介的发展脉络:梳理了从晚清开始,科幻小说译介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内容之一,在改良社会、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阐释了现代时期科幻小说翻译所运用的章回体形式和归化翻译的策略,以及在“民主”与“科学”口号下,中国部分科幻小说对外国科幻作品的仿写;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科幻小说译介从五六十年代受苏联影响,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科幻春天”的兴起,再到新的历史沉寂,并论述了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译介数量与质量双重提升的现象与缘由。除此之外,这些研究还展现了个人译者、出版社、科研机构、科幻期刊杂志以及文化公司等百年中国科幻小说译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二是从微观层面对译作进行分析。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是刘慈欣的《三体》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这两部作品的成功与译介密不可分,围绕这两部作品的译介之路展开的研究基本上囊括了其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全部要素。首先最核心的是内部因素,即文学特质,在中国科幻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孕育出优秀的本土科幻作品。其次是译者的因素,既包括翻译对象的选择,也包括翻译策略的使用。译者所遵循的目的原则、通顺原则、忠实原则使得翻译兼具可读性和欣赏性,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科幻的阅读期待⁴,翻译过程中对部分情节做出的调整,如完善人物性格、改变对话的呈现方式等,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文学性⁵。而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辅以副文本的翻译方式从整体上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⁶。最后是外部因素。翻译的环节完成后,接下来便是面向市场。在此过程中,当地出版社和译者长期以来积累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对作品的价值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作品在国外获奖情况、图书馆馆藏量、知名人士和普通受众的评论等进一步为其赢得市场口碑;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多重场域中的多元主体以及技术的创新等共同推动了作品的海外传播⁷。该时期学术界对以《三体》和《北京折叠》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外译过程进行了完整的剖析,具体细化到每一个环节,这些成果为中国科幻小说未来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随着中国科幻小说译介的增多以及译作品质的不断提升,学术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译者。既有郭建中、王逢振、吴定柏、朱振武等为代表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型译者;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非学术类译者,他们有的是期刊编辑,有的是小说作者,还有的从事非文学类工作,如计算机行业从业者、法律工作者等,均是源于对科幻小说的兴趣而投身翻译。当前这一自发性的翻译群体正不断壮大,已经成长为科幻译介的重要力量,受到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其中作为研究对象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三体》和《北京折叠》的译者刘宇昆。刘宇昆本人也是一名科幻作家,如果说美籍华人的身份作为作品的跨文化转换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么科幻作家的身份则加深了他对“科幻”内核的理解。学术界关于刘宇昆的研究多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结合译者本人的翻译经验,从语言、文化、交际等方面探讨相应的翻译选材、翻译思想和翻译态度,考察多维度的场景适应与策略选择。关于中国作品的外译,有学者曾提出“一定要把翻译的问题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背景之下,去审视、去思考”,认为国外汉学家在翻译中文时“对整体的中国文化还是把握不了,一旦涉及到他研究的专题之外,他们往往就会捉襟见肘了。”⁸因此刘宇昆的跨语种、跨文化的双重身份,对于他理解原作并将之转化为译作很有帮助,他在翻译时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努力做到在不改变原作的故事情节、精神实质等的前提下,达到了既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体验,又保留原作的东方韵味与中国特色的效果。在刘宇昆的翻译中,中国文化在英文世界得到了完美的兼容,而作品中涉及跨文化场景的部分,他添加了相应的注释,有助于读者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他们提供更为丰富、立体的阅读体验,避免由于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阅读难度。刘宇昆作为一名深谙中国文化的美籍华人科幻作家,他的创作和翻译在硬核科幻的世界中,构建了独属于东方美学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

三、新兴科幻小说文类研究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科幻小说与网络、电脑等飞速发展的科技结合得更为紧密,科幻小说流派逐渐增多,而关于科幻小说的研究也随着科幻小说类型的不断丰富,出现了极富时代特点的新内容,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研究浮出水面,成为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的又一突出特征。

首先是对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研究。“赛博朋克”作为新兴科幻小说类型,在新世纪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备受读者的喜爱,随之引起学界关注,相关研究浮出水面,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动向。“赛博朋克”(Cyberpunk)的概念由“赛博格”(Cyborg)

演变而来，后者是由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两位科学家将单词 Cybernetic 和 Organism 组合而成⁹。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第一次从理论层面对“赛博格”进行剖析，而赛博朋克这一科幻类型的出现缘于 1984 年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¹⁰。关于赛博朋克究竟是什么，直至今日仍没有定论，但是却能够根据作品的特征进行判断。首先是无处不在的高科技，尤其是计算机与人类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既有肢体上的一一利用计算机修复受损的躯体，也有精神上的——通过计算机控制人的思想等，此处的计算机并非外部机器，而是成为人类本身可控制的一部分，人类与机器人的界限由此变得模糊，而这样的设定一定程度上符合 Cybernetic 的含义。其次，故事的背景都设定在未来网络高度发达的年代，主人公所在的都市具有昏暗、颓废的氛围，来自夜店、酒吧的霓虹灯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音乐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感很强。另外，主角的日常工作与行为常常处于违法的边缘，城市里充斥着艺术家、警察、街头小贩等群体，因此作品中的对话偏向于俚语……能够看出，赛博朋克类科幻作品通过文字传达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其概念的打造既有时代背景、城市风格等外在气氛的烘托，也离不开角色自身独特的躯体、精神、语言等设定。

“赛博朋克”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关于赛博朋克科幻的研究百花齐放，总的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赛博朋克”概念的追溯与阐释，并对具有代表性的海内外研究从整体上进行梳理。二是从后现代、后人类等理论出发，解读赛博朋克科幻文化，这些研究提出赛博朋克小说的内容、创作手法以及融入大众文化的过程都具有后现代主义融合与内爆的特质¹¹，认为赛博空间中的人类被重新建构为后人类，由此思考如何维护和重建人文价值与人的主体性¹²，研究者结合后人类理论与威廉·吉布森的小说，从人文主义和人类的主体性探讨人与高科技的共生关系¹³，思考后现代主义中人的价值观，认为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大众的艺术趣味以及社会与艺术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精神解构，这些都符合赛博朋克的风格特征，体现出文化的融合¹⁴。三是从空间、视觉、虚实等多维角度解读赛博朋克小说，有的从技术角度、地理空间、文化、权利等方面对赛博朋克刻画的反乌托邦都市空间进行解构¹⁵；有的通过鲍德里亚的仿真实论对赛博朋克的真实与虚幻进行剖析，以此探讨计算机系统所生成的赛博空间的真实性以及后人类时代人与机器的界定¹⁶；而赛博朋克元素中的融合性与冲突性，科技性以及阴暗性成为部分研究关注的对象¹⁷；还有的研究从设计符号学的角度，归纳了赛博朋克风格视觉图像中视觉元素作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为赛博朋克今后的视觉创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¹⁸。关于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小说层面，小说只是研究对象的载体，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了关于生存、空间、虚实等更为多元、立体的研究。

其次是与“人工智能”主题相关的新兴科幻小说研究成为另一亮点。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存问题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该时期的研究多将科幻小说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探讨人工智能发展中面临的人与机器的关系、虚与实的界定、法律边界与伦理道德约束等。主要涉及如何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包括人类面临科技挑战如何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如何处理科技对人类既有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冲击等。其中机器人伦理问题最受学界关注，一是最基本的围绕“人”与“机器”定义的不断变化，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¹⁹，涉及从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元伦理学层面探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伦理价值的冲击²⁰。二是围绕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探讨随着机器自由意识的觉醒、身份的转变所带来的人机关系的演变²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人机关系的认识如何突破二元伦理困境²²，并由此产生的自我认知改变²³。三是从“克隆人”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相比于机器人、人造人等最接近人类物种的伦理身份问题，以及引发的对个体生存悖论、道德判断、情感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虽然克隆技术是上一个世纪的产物，但是由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社会性反思却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当今人工智能得到长足发展的时代。这些都无可避免地带来法律层面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关注到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探究当今社会的法律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如何维持既有秩序的问题²⁴，反映出人类正在逐渐将自我进化和人工智能升级放到统一的维度去审视的趋势。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层面，涉及伦理学、空间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人类理论等。在 21 世纪互联网大爆发的背景下，赛博朋克、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幻小说类型、科幻主题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虽然离形成规模性研究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赛博朋克类科幻小说所代表的末世感、重工业风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而人工智能类科幻更是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对它们的关注会只增不减。

四、研究反思

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研究热潮更迭，视野趋于开阔，不再局限于文学价值，而是跳出艺术审美，开始往更加社会化的问题层面发展。显然，新世纪科幻小说研究成为了一道靓丽风景，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有一些现象与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对个别作家及作品的过度关注。科幻小说研究热潮中，不论是2012年《人民文学》重新刊发系列科幻作品，2015年《三体》的获奖，还是2019年《流浪地球》的热映，都与同一个作家——刘慈欣有关；而科幻小说的译介热也离不开刘慈欣的作品《三体》。在当代中国大陆科幻界，刘慈欣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刘慈欣”三个字成为一种符号，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科幻的代名词。对中国科幻界来说，这种现象既是“幸”也是“不幸”——一方面，中国科幻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有了足以与世界科幻文学相提并论的作品，能够带来学术的集聚效应，形成规模化研究；另一方面，对刘慈欣及其作品的过度关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其他科幻作家、作品的研究，造成学术研究的新“盲区”。中国科幻界不乏有成就的作家，从早期的徐念慈、包天笑、顾均正，到后来的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肖建亨、刘兴诗，再到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王晋康、韩松、何夕，以及更新一代的陈楸帆、郝景芳、飞氲、萧星寒，都有各自擅长的科幻创作领域，作品屡次获得科幻类奖项。他们共同推动着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学术界应当从中发掘、拾取更多有价值的问题，构筑中国科幻小说史，推动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而不是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个别作家和作品上。中国科幻小说一直处于被主流文学所遮蔽的角落，在它逐渐发出自己的亮光时，对某位作家的过分关注，无疑又将其他作家作品置于角落，这种内部消耗对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必会产生不甚健康的影响。

第二，科幻小说研究队伍过于年轻化，力量相对单薄。从发表科幻小说论文的学者来看，年轻学者毫无疑问占据主力位置，甚至一些关注度较高的论文多来自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年轻学者能够及时追踪科幻最新成果，对科幻小说进行多角度综合解读，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活力，注入新的能量。近年来，《文学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探索与争鸣》《中国出版》《电影艺术》等核心期刊，刊发了一些青年学者的科幻类研究成果，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认可，研究水平整体处于上升阶段。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年轻学者占主力反映出一些已经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对科幻文学的忽视。科幻小说研究队伍目前的情况是，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青年力量，中生代与新生代势头强劲，提升了科幻小说研究的曝光率，但因缺乏真正的学术带头人，导致科幻小说研究仿佛一块自留地，研究者们如同当年的科幻作家一般，产出很多，但是很少被看到也不被理解，处于一种尴尬的内部狂欢境地，致使科幻小说研究难以产生真正的“高峰”。如果科幻小说研究能够汇集文学领域的部分学术带头人，那么既会扩大科幻文学的影响力与认同感，增加研究的厚度，又能保证持续地有新鲜血液注入，维持一种健康的研究生态。

第三，部分研究成果内容重复，缺乏新意。科幻小说研究在新世纪得以推进的原因之一，是不断有新的研究者进入该领域，然而由于涉足科幻小说时间不长，他们对前人的研究大都未进行系统的梳理，造成部分研究者不断重复以往的研究，数量上的提升没有带来质量上相应的飞跃，未能超越前人的研究思路，提出新的观点，展开新的论述。一些研究停留在对科幻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阶段，实际上科幻小说研究领域早就不缺乏此类概括性的成果，缺乏的是针对不同时间段所做的深入、细致的挖掘和阐释。还有一些研究者仍然在重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科幻小说姓“文”还是姓“科”的探讨，从呈现的效果来看，部分研究只是对论争进行梳理与归纳，未从参与论争的对象、所属机构、发表文章的刊物、论争背后所体现出的话语权等角度展开，提出有建设性的观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术界对现代时期科幻作品的研究十分有限。晚清作为中国科幻的开端受到了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对晚清科幻作品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对于接续晚清的现代科幻小说，学术界却鲜有关注。已有研究要么将现代科幻小说与晚清科幻小说合并为同一时期进行叙述，要么仅用顾均正作为唯一的例子一带而过，有的甚至直接跳过。由此带来的误区便是现代时期没有值得研究的科幻作品，这种误区一旦形成，久而久之便会形成学术的“洼地”。如果在这片学术洼地展开研究，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由此可见，如何避免研究内容、主题的雷同，同时对学术洼地展开研究，是学界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一直处于“断代”的状态——在复苏与沉寂之间切换，难以形成历史的连贯性，很多作家和作品散落在历史长河中，无形中加大了科幻小说研究的难度。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除了需要优秀的作品作为支撑，同样需要高质量的研究作为辅助，在对科幻小说历史“考古”的基础上挖掘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最终形成创作—批评的双重环节，构筑更加牢固的中国科幻小说长城。

注释:

1 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25日。

2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 王雪明、刘奕:《中国百年科幻小说译介:回顾与展望》,《中国翻译》2015年第6期。

4 黄唯唯:《〈三体〉的英译研究——让中国式科幻走向世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

5 徐松健、孙会军:《〈北京折叠〉英译本对原文引语的处理及分析》,《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

6 吴贇、何敏:《〈三体〉在美国的译介之旅:语境、主体与策略》,《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7 吴攸、陈滔秋:《数字全球化时代刘慈欣科幻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8 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东吴学术》2013年第2期。

9 1960年,美国NASA两位科学家Manfred Clynes和Nathan Kline一同创造了Cyborg一词。

10 《神经漫游者》由美国籍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创作,这部小说获得了雨果奖、星云奖、菲利普·迪克奖,被誉为“赛博朋克《圣经》”。

11 束辉:《赛博朋克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质》,《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9期。

12 冉聃:《浅析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汉字文化》2019年第12期。

13 胡戈:《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与后人类世界》,《职业时空》2007年第19期。

14 游宇熙:《从赛博朋克看后现代主义美学中的文化融合》,《大众文艺》2017年第15期。

15 陈榕:《赛博朋克小说中的都市空间想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6 胡戈:《由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看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2期。

17 周全、周小儒:《论基于赛博朋克精神内核下的视觉艺术表现》,《大众文艺》2018年第1期。

18 朱江持:《设计符号学视角下的赛博朋克视觉元素探究》,《设计》2020年第11期。

19 吕超:《西方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伦理》,《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20 计海庆、孙路:《科幻小说的伦理解读》,《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0期。

21 陈涛：《科学选择与伦理身份：阿西莫夫小说中的人机伦理关系》，《华中学术》2015 年第 2 期。

22 彭奉天：《不“伦”不“类”：科幻小说〈机器管家〉中的人机伦理困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1 期。

23 计海庆：《机器人的社会地位——读四本科幻小说》，《科学文化评论》2009 年第 4 期。

24 郑戈：《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10 期。